



中國商業的發展

戴行軔

一 緒言

今

日社會是在什麼時代呢？不消說是在資本主義將沒落的時代

。中國今日在什麼社會時代？不消說

也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主義是

商品的生產，所謂商品的生產是指不

以自己使用爲目的，而以營利爲目的

的生產。此外資本主義還有勞動成爲

商品，資產階級獨占了一切資本的特

徵，不過這兒不是論述資本主義的性

質，暫且拋開他。不過我們要明瞭他

爲獲利而生產的商品，將怎樣使他獲

利呢？那是一定要求市場，而經營市

場的東西就是商業。如果沒有商業，則市場上的交換關係當然無從成立。

所以要明白資本主義的內幕性質，一

定要懂商業的情形，而且要詳細的分

析商業的情形，才能明瞭。

近代資本主義的母體，就是封建時

代的商業資本。固然今日商業資本已

由產業資本過渡而爲金融資本，獨占

的形式也發展得異常神速。那麼，我

們要是明瞭了商業發達的過程，不是

沒有用了麼？可是商業乃是發展資本

主義的最早形式，我們自然不該忘了

他，也許從那裏可找到資本主義發展

的途徑；何況在金融資本時代，交換

也是省不了的，市場和商業組織自然都是必需的，我們要研究現實社會的情形，豈可拋却商業的研究呢？所以我覺到商業發展的史蹟是該研究的一回事，而且在這個資本主義時代的人們，更應該研究商業發展的過程。

現在試說明中國商業發展的經過。其時代的劃分，也可以和社會時代劃分一樣的。

- 一 原始社會的商業（自太古起至殷庚止）
- 二 奴隸社會的商業（自殷庚起至周初止）
- 三 封建社會的商業（自周初起至秦朝止）
- 四 過渡社會的商業（自秦朝起至鴉片之役止）
- 五 資本主義社會的商業（自鴉片戰役起）

二 無商業行爲時代

在原始的社會裏，商業似乎沒有什麼需要。因爲那時候人類的社會只限於一個氏族，或是一個部落。生產是由全部人的盡力，分配是由酋長執行，所以個個都有同等的所得，用不

著商業。詳細些說就是：

第一：在這個社會中，過著游牧的

生活，每個氏族或是部落之內，人口稀少，土地廣大，分業也極有限。他們生產是個個分子該負的責任，由會長指揮著。分配也是由會長公共分配著。所以那時候沒有什麼階級，沒有貧富，沒有貴賤，都是如老子所說：『各盡其能，各取所需』過活著。

第二：在這個社會中，他們生產的目的，祇是為著氏族或部落內人們的消費，大家要消費多少，就生產多少。況且那時候生產工具十分粗拙，很受自然的支配，不容易使生產品增大，所以在這樣狀態之下，商業行為是不可能的？

第三：在這個社會中，各個人們，都有血統關係，差不多個個分子都似父子般母女般一樣關係著。商品就是有了，也因為商業是實利的性質，以

這樣的血統關係，發生了貿易的事情，似乎也太沒有面子了。

第四：在這個社會中，過著孤獨的生活。各民族各部落都有特殊的標幟，特殊的主義，他們因此都在仇視中，在戰鬥的準備中。所以他們和鄰居氏族或部落常常隔離著。要想氏族與氏族間，或部落與部落間，作物物的交換也有所不能。

總之，原始社會是很原始的，無論從生產與消費的關係，交換與分配的關係，對內與對外的關係，各族與各族的關係，都沒有發展商業的可能。

中國在原始社會時代的商業情形怎樣呢？不消說是不能違反世界各國歷史的原則，在那個時代有商業的發生。可是事實上似乎中國商業在那時已有了。如易經說：『庖犧氏歿，神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通

典說：『立鄺于國，以聚貨幣。』路史說：『神農范金排貨，以濟國用。』

可見神農氏的時候，中國已有市場而且有貨幣了。甚至據文獻通考說，太昊以來已有錢幣，路史說是：『伏羲制用前民，因聚天下之銅，仰視俯觀以爲棘幣。』那麼？不是言之鑿鑿麼？是的，言是有的，可見太史公早有『夫神農以前，吾不知矣！』可見後於太史公數百年以至數千年的歷史作家如杜右馬端臨等那能知道呢？可見其言之不可信了。何況他們所言，又有不合科學的地方：

第一：商業的原始情形是行商制，不是市制，在畜牧社會祇有行商的制度，那麼在畜牧社會以前數千年，那裏會生出市制？

第二：原始社會是在石器時代，我們在考古學上研究殷還是金石併用期的開首時候，那麼在殷以前數千年，

怎能發生金幣貨幣？

可見他們實在太矛盾了。要之原始社會本來沒有商業發生的條件。

三 族與族間交換時代

經過了原始社會，入了奴隸社會上去。就是說，那時候已有階級的存在了，治者階級是主人，被治者階級是奴隸。在原始社會時代氏族與氏族間的鬥爭，不斷的發展著，戰敗者是被殺了，而滅種。可是後來勝利的氏族，以爲那個方法太不中用，開始叫戰敗者俘虜爲奴隸，絕對的強迫他們生產，而主人自己却是分出他辛苦勞動所得，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中有言：『一切部分——牧畜、農業、家內工業——中的生產的增加，較對於人類勞動力的維持上所必要的生活品，給與生產更多的能力，同時，牠又使……增加了日常的勞動量。』生

產品既因奴隸辛勤的生產而增加，于是可以發生一些剩餘來了，可以給人們交換的慾望了。

一方面生產的工具進化了，生產的力量也增加了，生產品也發展了。自然容易增大了剩餘，這剩餘自然是交換的商品了。經濟學批判中說：『腓尼基、迦太基等商業民族，是在古代世界以純粹的商業民族而出現的，但是這種純粹性，正是農業民族之優勢的情形所給與的。』可見生產工具發達的氏族容易對外發生貿易動機。

最初他們交易的單位，是種族與種族的，種族間的交換漸漸發展，於是商業成了雛形。山川均在資本主義以前經濟史對於這事有比較詳細的敘說：『最初不過是以直接消費爲目的的過剩生產物，偶然交換的，但隨著生產技術的進步，種族間的分業也發達起來，且因生產力的增大，而過剩的

生產物成了利益，因此交換逐漸從例外的、偶發的狀態，發達到正規的狀態，因之就逐漸帶了商業的性質。』最後，『尤其在種族內部，隨著分業的發達，而種族內的交換，也逐漸成爲常規的商業化。』在奴隸社會中商業就是這樣的發展。

種族間的貿易是在種族與種族交界內進行著，所以還沒有市場，不過是兩民族有剩餘的時候在那裏交換而已，其情形其手續異常簡單。中國那種商業行爲也許在原始社會已有，不過總是不多的。時代推移之後，商人似乎成立了一個階級，因爲財產私有了之後，商人就應運而生。不過那時候的商人不是現在一樣的列肆坐賈，以待賣買，而是奔波各族間做買賣行爲的商人。那就是行商。中國在歷史上是有行商存在的，在周易上說：『旅即以懷其資得童僕。』又說：『旅焚其

次喪其童僕。」又說：「僮僕。」在那裏我們又可知奴隸在當時也可以買賣，無異是牛馬。又可知那時候的貨幣還是貝殼。易經是畜牧社會的產物，大概是不可否認的。那麼族間的交換情形可想而知。

在那時既發生了貿易，那麼貨幣是該有了。最原始時代是物物交換，以後金屬發明了，因為金屬有（一）有分割及再接合性，（二）比重大，（三）耐久性，（四）柔軟性。于是開始用金屬的金銀來做貿易的標準。可是那時還是自然經濟與貨幣經濟混合著，因為金銀還是不多！管子所謂：『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又說：『龍夏之布黃金九千以幣資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這種狀態很有奴隸時代的情形的。

總之：中國在殷以後始入族與族間交換時代，就是最原始的商業時代。

那時候還沒有市場和整個的貨幣制度。就是完全在行商交易及自然經濟與貨幣經濟互用時代中。

四 都市經濟時代

由奴隸社會遞演而爲封建社會，社會上階級的劃分是更利害了，生產工具也加倍的進化了，商業也由族與族的交換關係，開始入於都市經濟了。

那時候在中國爲周朝的一代，當然是包含著春秋戰國兩個時代。都市經濟自然比族與族的交換時代好得多。那時候都市是成立了，而且很繁盛，商業資本及高利貸資本也發生了。試問爲什麼要進步到如此呢？族與族的交換關係爲什麼跑入都市經濟去呢？那裏有四個原因：

（一）生產發展得神速——那時候生產工具改爲鐵器了，鐵器是比任何的金屬爲硬，比石器精密得多些。用了

這個來生產，實比從前便利得多。因爲是便利了，當然出產是不斷的增加著，這種發展的神速，不是我們能想像的。因此生產組織漸漸由爲自己消費而行的生產，變爲爲別人消費而行的生產了。換句話說，就是漸漸由自給自足的經濟，走到商品的經濟了。生產物成了商品，自然使商業行爲擴大了好多。

（二）分業精密得神速——生產品發展了之後，分業也精密了。在原始氏族社會裏面，祇有男女的分業，而且無論什麼消費品都在本氏族內製造，因爲氏族對外是隔離的緣故。到了奴隸社會，分業漸漸發展。而且有許多氏族因環境與人才的緣故，只向特定一方面去發展。自是以後，某個氏族或種族遂不能自製一切東西，從而從前的鬥爭遂歸消滅，而代以有無相通的商業行爲了。

(三)都市商業的完成——在奴隸社會，商業祇不過是行商、行商是流動的商人。以後他們在陸上在海上交通

發展之後，這種行商漸成了常規，自然就發生了商人集合的場所。那就是市場的起原。他們的市場當然是交通便利的地方，每在一定的時候，四方的商人都來了，他們互相交易著。伴著市場而起的是工業，手工業者在都市中努力的工作著，以求他們所成的商品得在市場上銷售。於是工業與農業分離，都市與農村分化了，商業都市成立之後，固定之後，商業自然更加發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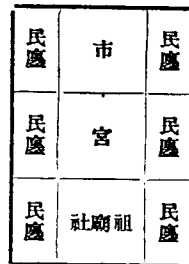
(四)貨幣經濟的完成——在都市經濟以前，自然經濟與貨幣經濟還在互用中，其原因是爲了那時候金屬還是很少的，不得不與自然經濟並行著。到了都市經濟時代，金屬增加了，於是才完全發達爲貨幣經濟。貨幣經濟

成立了之後，於是商品這東西，才成爲商品。

在上面我把那都市經濟得以成立的原因解釋完了。中國在那周朝的時代，有了上述四個條件，所以才產生都市經濟。最足代表都市經濟的是齊趙三國。現在就是該釋明中國的情形了。

周朝是很注重於商業的，當未入據中原以前，文王治岐，孟子曾說他是「關市譏而不征」。可見他是用力招待商人的，有力發展市場的。到了中原，他究不會忘却這個，如逸周書武王「令縣鄙商旅曰：能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開開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遠旅來至。……商賈趣市以合其用，外商資貴而來，貴物益賤，資貴物，出賤物，以通其器。夫然，則關夷市平，財無鬱廢，商不乏資。」他們一方面採招徠

商人的政策，一方面又制定了九府圖法，確定了貨幣制度，使商人在交易方面便利起來。那都是富有商業智識太公所計劃的。此外周公確立商業的官制，和商稅，並在京城先立了市場，那是開後世城下都市的風習。他所計劃的首都市制如下圖。



可見那时候商業已繁盛了。自從周室

東遷而變成春秋戰國的時代，那时候周室本身的商業是衰落了，不過近海諸國，如齊、趙、越等三國，却是開了空前的盛況。這實有分述的必要：

(一)齊——太公封齊，即有魚鹽之利，管仲扶助桓公經營國家大政，也拼命的提倡魚鹽之利，大大的獎勵商人，他說是：『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

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管子)因此他劃分政治區域，也把經濟區域劃定了，國語上說：『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有五。』這工商之鄉，恰有商人殖民地的形式。那時候齊國商業發達，正可引戰國策中蘇秦說齊宣王條的話，他說：『臨淄(按此係齊之都)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渾汗成雨，家數而富，志高而揚。』可見那時候齊國商業的盛況。梅

思平所以斷定他爲資本主義的國家。

(二)越——吳越和齊有同一的地理環境，可是他們沒有齊國的商業人才。後來吳國會有一度的強盛，但是他們不知商業的經營，所以到了軍事勢力衰了的時候，他們的國家就有「市

無赤米」(見國語)的慘狀。越國却是沒有這種缺點，他們有商業人才，如計然范蠡輩，和齊國的管仲有同樣的勞績。計然「嘗處吳楚越之間，以漁三邦之利」。(見絕越書)范蠡有「止於陶，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見史記)的故事。就全體民族說來，『越王句踐，困于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修之十年，國富厚賂。』(見史記)他也無異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

(三)趙——趙的環境和齊吳越同一，可是就商業上比較起來，不免較他們爲遜色了。他們的商賈，也是很多的，如史記五侯世家說：『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爲賈人，權會入多於國經租稅。』有了賈人必有商業都市，那時趙地邯鄲是一個極熱鬧的地方，如漢書地理志說：『邯鄲……一都會

也。其土廣俗雜……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嫁娶送死奢靡。』真的，趙也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至少是富有資本主義氣味的。

此外如晉、楚、鄭、秦、魯等國商業也異常發達，商賈也異常衆多，但不如這三國一樣的繁榮，現在只好略而不說了。可見濱海的地方是容易發展商業，這與腓尼基、雅典、希臘得早成立商業都市有同樣的意義。

那時候的資本形式是怎樣呢？簡括一句說：那時候盛行高利貸資本和商業資本，就是前期資本主義。你看在那時候不是有孟嘗君客馮諼焚券而持券人稱萬歲的故事麼？焦氏易林不是有「陶朱白圭善賈，息資三致千金，德施上仁」的故事麼？真的，那時候商人一方面擄取其支配領域外的生活者，一方面又擄取那商品的消費者。那就是封建社會應有的特色。

五 過渡社會的商業

中國社會的確是謎一樣的國家，既然封建時代破壞了，可是資本主義社會却未曾建起。徬徨又徬徨，徘徊又徘徊，經過長長的十幾個世紀，也許足有二十個吧！這個過渡時代，一切都是過渡的，都是封建社會過渡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橋樑。商業自然不是例外，也是過渡的。在事實上說，這個過渡時代說他是過渡，還是說是反動的殄落的時代吧！在封建時代中國商業本是已結了花苞，待那暖風的煦吹，陽光的普照，自然很容易開起花朵來，可是在過渡社會時代，却沒有暖風惠日，却是嚴冬堅冰，中國的商業是這樣殘損了。什麼是嚴冬堅冰呢？分析說來，約有四點：

(一)中國經濟是自給自足的——商業的繁盛第一必要有工業的出產，第

二必要有農產的賸餘。第三必要有衆多的主顧。在中國的過渡社會中是一個條件也不合，一個條件也不具備。

中國的手工業雖早在原始社會發生，可是其所生產的是極少，只能供自己的用，到了封建時代，工脫離了農業，獨自成立了一個行業。在子書上累累的載著，如列子「工追業」。慎子「工不兼事，則事省，省則易勝」。韓非子：「夫匠者，手巧者也」。荀子「百工分事而勸」。可見那時候工人不但已脫離農業，而自己旦夕在規矩中做事，并且也有簡單的分工了。可是農業可以自給自足，在春夏秋的農忙季節，固是在阡陌中奔波，在烈日下渾汗；但是在冬天百物收藏之後他們閑了，于是織布而衣，蓋茅而住，修路而行，來整理一切，在中國農夫都是如此的生活著，似工所生產的東西，商所轉運的東西，在他們沒有什

麼必需。於是手工業不能發達，機械工業更是夢也不需要。實業革命既不能產生，要像歐洲一樣由中世紀封建社會，進化爲資本制度是不可能的。

農業在中國，也是極可憐的一回事。中國的農業經濟完全是原始的，他們祇用手工的，最好的不過是能達到「深耕易耨」吧了。所以農產物不多，自己只能供給自己。何況水利經濟未有科學的籌劃，一旦水災旱災的襲來，或是害蟲的到來，農民們祇有束手待斃。「三年耕而有一年之食，九年耕而有三年之食，」便是一個明徵。因此農業的出產無論是小地主或是個農都沒有賸餘，連大地主也恐怕年凶的襲來。要他們以他們自己的賸餘去逐什一之利，似乎不能做到的。

主顧多是多了，在從前雖是沒有四萬萬，可是十之九是極貧，因爲農業是沒有多大獲利的可能；而且小地主

和佃農這時有沒落的可能，在那大地主的霸佔和專利政策之下，農民時有

流亡的末運。例如漢書食貨志引朝錯

的話：「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耨，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之所以兼并農人，農人以流亡者也。」農人在這苦楚下過活，自己保不住衣食，還有發售貨物的慾望麼？所得和消費總是成正比例的，那末中國農民購買力薄弱，商業那有發展的希望？

總之，中國因爲是以農爲本的國家，他們個個人經濟是自給自足，不必商人轉運，因爲他們都無買別的東西的必要，商人在這一個環境之下，那

能發展他的野心呢！於是商業就不能活躍起來了。

(二)中國貨幣是十分紊亂的——我們知道貨幣是貿易的標準，沒有貨幣便沒有貿易的行爲，沒有貿易的行爲，那能產生商業？中國貨幣發生甚古，既已說過，可是中國雖發明了貨幣，而沒有固定貨幣的價格，一方面却還是貨幣交易與物物交換並行著。因此中國貨幣是十分紊亂，在這個局面下貿易行爲自然不能迅速的增大，商業於是在歧路上徬徨著，不能火速向前飛進。詳細些說：

貨幣雖是多得很，延用得很廣，可是人們以爲鑄貨幣是有利的事業，像

今日私鑄貨幣一樣私鑄起來了，於是貨幣的質低下，量又衆多，價格自然低落了。這種事實在歷史上記著的很多很多，恕我不多引了。例如：漢書食貨志：「孝文五年爲錢益多而輕，

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宋書何尚之傳：

「先是患貨，重鑄四銖錢，民間頗多盜鑄。」宋書顏竣傳：「景和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改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延環錢，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賈不行。」魏書楊侃傳：「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值一千。」可見中國貨幣經濟時有不中用的時候，好像近日資本主義恐慌一樣的循環著，一到恐慌的到來，商業就不中用了。

貨幣固然有了，可是物物交換還是存在著，因此商業發展就受了嚴重打擊。中國在封建社會中固有「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可是在過渡社會也時有反於自然經濟

之勢。你看：『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孫述廢銅錢鉛鐵錢，百姓貨幣不行。』又如：『自莽亂後，

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又如：『魏文

帝皇初二年，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

帛爲市。至明帝代錢廢，用穀既久，

人間巧僞漸多，競溼穀以要利，作薄

絹以爲市，雖處以嚴刑不能禁也。』

又如：『晉安帝元興中，桓元輔政，

立議欲廢錢用穀……議不成。』又如

：『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

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

廣之域則以金銀爲貨。』可見那個時

代國家紛亂，錢幣時有不能行之嘆。

及到元代還有以貝代錢的古俗，例如

：『雲南民以貝代錢，是時初行鈔法

，民不便之，賽典赤爲聞于朝，許其

仍俗。』(元史)在這種制度下面，貨

幣經濟在社會上還沒有固定的地位，

要想以這個形勢，跳上商業資本上去

，真的「是不能也，非不爲也」！

(三)中國交通是極不發達的——中

國民族定住在亞洲大陸，在大陸上一

條條的崇山峻嶺，一條條的溪谷大河

，無論到什麼地方去，都是有「蜀道

難，難於上青天」的情形。交通器具

是異常笨拙，不能予人們一個十分的

方便。交通對於商業，是很有關係的

，國吉省三氏著鐵路經營論內曾說：

交通是有迅速的、安全的、大量的、

低廉的四個利益，真的交通是資本主

義社會必要的東西，資本主義之有交

通不祇是如火益烈如水益深，並且可

以孕育資本主義於搖籃中呢。歐洲資

本主義社會所以成立於產業革命，開

始於大發見的時期，就是爲著這個。

在中國，交通可說沒有，所用的笨拙

器具，是決不能發展商業的。其原因

是：(甲)不迅速，使貨物有腐爛的可

能；(乙)不安全，使貨物有發生危險

的可能；(丙)不大量，使貨物有不能

完全運載的可能；(丁)不低廉，使貨

物的價值容易高漲，而不受賣主的歡

欣。商人有了這許多的難點，利市三

倍那能做到？萬商雲集那能可行？我

現在可以不必來舉例說明中國交通困

難的情形，你自己閉目凝神想來，一

定覺到我的話不是空谷來風全屬子虛

的。所以中國人不能如地中海民族，

遠遊海上，樓船十萬，破浪乘風，遠

震海外；就是本國吧，也範圍極小，

利益極低的！

所以中國的商業在過渡時代不能發

展。可是我們究不能否認過渡時代沒

有商業的話。商業在這個環境下還掙

扎著，在國內固是商業有了，和外國

互市也在那個時候發生。我們要說明

這個時代的商業，就是該把國內的和

國外的分成二個單元，因爲各有各的

情形，不是如同一律。

先說國內。國內的商業真是可憐得很。所謂商業還有土地黏性，不能獨立發展。社會上對於商人的地位——視他做逐什一之利——很低微。商業的都市也祇是城下街，範圍極狹。最可注意的商人的資本不會放在工業資本上面，甚至高利貸資本還很缺乏，大多數都是窖藏著。可見國內商業雖是有了，實際上還沒有。資本雖是有了，可是還沒有再生產去。都市雖是有了，還是與政治不分離。商人雖是有了，社會上還當他是贅物。夠了夠了，中國商業夠落伍了，中國社會夠落伍了。試來拆穿這個西洋鏡吧！

(一)中國商人都有土地黏性——中國商人和外國商人不同的是外國商人祇要資本，便能經營。中國商人不但要資本而且要土地并且要勞力。例如在史記貨殖列傳所舉的如：『烏氏保畜牧及乘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

王，戎王什倍其價與之畜。畜至，用谷量牛馬。』又如：『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貨。』又如：『蜀卓氏之先……用鐵治富。』又如：『宛孔氏之先……用鐵冶為業。』又如：『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甚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此外還列據著：『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也；賈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而邴氏鼎食。……』總之，這種現象真如方岳所謂：『由此可知春秋到漢時的富裕階級有一部分

的營利方式是：G—G'，或是G—M，而不單是M—G—M'』（見氏著中國封建制度的消滅）所以我們知道中國商人富有土地黏性的。

一方面商人之所以致富，并非容易的事，幼稚的商業，必有特於工業，工業的最有利的是奴隸。商人之能致富，都在榨取奴隸的賸餘上。你看：『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黑綈，夫人自紡織，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織維，是自能殖其貨，富于大將軍光。』（見漢書張安世傳）所以奴隸社會雖早已過去，而奴隸本身還不能廢。這許多奴隸除了富豪用以作奴婢外，別的人家終是強迫奴隸生產，來榨取他的剩餘，來富厚自己的資財。

總之，中國的商人不是獨立的一個職業，在過渡社會中，他們致富的門徑是土地和奴隸。

(二)中國商業都市的缺如——都市實是發展商業唯一的利器，也是商業發展重要的結果。可是在中國呢？封建社會雖建立了幾個都市國家，然入

過渡社會之後，連這幾個都市也不能保存了，更沒有純粹商業都市的產生。考都市的起源，約有數說：『（一）

莊園法說，即都市是發生於莊園之內，都市法是從莊園法產生的。倡此說者爲 K. W. Nitsch。』（二）馬爾克共同體說，即馬爾克共同體內的村落，築障壁及深溝，以圍繞其四周，終而成爲都市。提倡此說者爲 G. L. V. Maurer。』（三）地方共同體說，爲 Bel-

貿易，故沒有完全像西歐那樣的發達。』所謂城下都市，就是以京都爲商業都市。

在，是這樣的劃分著。在洛陽會爲隋的首都，在洛陽伽藍記所劃分的有三重，而且更精密，附圖如下：

市大陽洛

市東——通商達貨二里	里民皆盡工巧以屠販爲生資財鉅萬
市南——調音樂肆二里	里內之人絲竹謳歌天下妙妓出焉
市西——延臨治屬二里	里內之人多醴酒爲業
市北——慈孝奉終二里	里內以賣棺槨貨輿車爲業
別有——池財金肆二里	富人在焉

御道東

金陵館——處吳人投國者
燕然館——處北夷來附者
扶桑館——處東夷來附者
崑崙館——處西夷來附者

御道西

歸正里——吳人投國者賜宅於此
歸德里——北夷來附者賜宅於此
墓化里——東夷來附者賜宅於此
墓義里——西夷來附者賜宅於此

定市場而發生的，爲 R. Sohm 及 S. Rietschel 所提倡。』（五）宮殿說，即都市由王、僧正、領主、貴族等宮殿而發生的；（六）城塞說。』（見石濱知行德國經濟史）可是在中國都市有是有的，一件也不合上述的條件。中國都市和日本同一，日本都市的發生，據山川均說：『日本的封建都市，主要的就是城下都市，又因爲沒有海外

都中不但確定了經濟區，而且更分著小的區域。例如三輔黃圖廟記的長安狀況，『長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里爲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門隔橫橋大道，市樓皆重屋，又曰柱亭。樓在柱門大道南，又有當市樓，有令署以察商賈，貨財買賣，貿易之事，三輔都尉掌之。直市在富平津西南二十五里，即秦文公造物無二價。故以直市爲名。』長安是中國歷代首都所

真的，城下都市組織是十分嚴密的。至於那時候的都市實在不祇是貿易，而且有平準的功能。這是和西方都市不同的，也可見中國的商業是極原始的。商業所以繁榮在於競爭，商賈

所以富庶在於競利；可是中國政府却舉行平準，無異是使商業入於墳墓，所以資本主義不能發展。中國都市具有平準的功能，可以唐六典所記述唐宮市的情形為例：『京都諸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丞爲之式，凡建標立候，陳肆辨物，以二物平市，以三買均市。凡與官交易及懸平，贓物並用，中買其造弓矢長刀，官爲立樣，仍題工人姓名，然後聽鬻之，諸器物亦如之。以僞濫之物交易者沒收，短狹不中量者還主。凡賣買奴婢牛馬，用本司本部公驗以立券，凡賣買不和，而權固及更出開閉。其限一價，若參市而規自入者，並禁之。凡市以日午擊鼓三百聲，而衆以會，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聲，而衆以散。』可見中國都市乃有特別的功用呢！

現在就要說到都市繁盛的狀況。都市本可繁盛，何況政治而兼經濟兩重

機能呢！現在可不說別的，單就南宋都城杭州吧！在歐陽修有美堂記說：

『其習俗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湖皆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沒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在馬可孛羅游記說：『京師（即杭州）爲世界最盛繁華之地，當蠻子王后降伏伯顏時，曾獻降書，書中備述京師詳情。據說，京師城廣一百邁爾，有石橋一萬二千座，其高者雖大艦隊亦可通行。城中各工業分爲十二大區，每區有萬二千家，工人充塞其中；每家祇少

有十二工人，或多至二百四十；然工人竟無暇晷，以製造品銷路廣也。其地多大賈，人莫能測其富，皆養尊處優，家人坐食不事事，驕貴儼若王后。婦人都嬌麗，望之若仙。其俗工之子恆工，商之子恆商，雖富不變。』

（此係老圃所譯，載于申報十三年五

月）我們以杭州的盛況，可以探見別的城下都市了。

除了城下都市，自然還有別的都市，做商賈們會集交易的地方。如隋書地理志所載的，除了京師外，還有蜀、洛陽、鄴都、丹陽、京口、會稽、豫章、交趾等都市；可是有許多是過去城下都市的遺跡，有許多是交通的要津，而前者勢力比後者更大而繁。可見城下都市是中國內地都市的先河，是無可疑慮的。

總之，商業的興盛和都市有密切的關聯，而中國商業不發達，既可使商業都市寡少，而又和政治首都相並而行，由此可見中國商業的幼稚了。

（三）中國社會對商人的輕視——這也是阻害商業發展的東西。西方的人們對於商人十分重視，從而援助他，獎勵他，於是帝國主義得以樹立根基於海外，資本主義得能發育滋長迅速

的進行。可是中國不然，對於商人却是壓迫他、剷掉他、輕視他，社會環境既是如此，商人有什麼發展的希望呢？重重壓迫在商人的身上，商人想發展也成了泡影吧！中國為什麼賤視商人？中國政府為什麼不贊助商人？自有現在。

中國愛道德講仁義的，這雖是封建社會的產物，然而還在過渡社會中活躍。純潔的農夫，勤勞的工人，自然够得上中國士大夫的注意，商人的處世秘訣，唯有刁滑兩個字，例如張良以秦曉將下多是商人，很有利慾的念頭，他用了重寶誘他，他果然叛了。又如高祖討伐陳豨，知道豨將有動利慾的商人，於是用了金銀離間他，果然成功了。因此漢高祖下令商人不得衣絲乘車，惠帝下令市井子弟不得做官。就是恐怕商人做了官發生枉法貪贓的事。

何況「農以力盡田，百工以巧盡械器」（荀子），而商人呢，「操贏而制餘」（子華子），是不生產階級，是分利階級，而他們却比勤勞終年的農夫工人所獲利得多。如魏文成帝的詔說是：「大商富賈，要射時利，旬日之間，增贏十倍，上下通同分以潤屋，故編戶之家，困於凍餒，豪富之門，日有兼積，為政之弊，莫甚於此。」因此他下文就說：「其一切禁絕，犯者十足以上皆死，布告天下，咸令知禁。」（魏書）所以我說商人的分利，早已不能站在社會之上，而他們却又是豐衣足食，自然更引起人們的不平。下有甚之者，上必有好之者，於是商人不能在社會上站足了。

最澈底的說，中國是農村經濟，本來無需什麼商人。商人在農村中是分利者，自然不是農村中人所能美滿，因此舉行排斥他的工作了，奚落他的

工作了。中國人們究如何奚落商人呢？一方面收要物為官賣，一方面加重商人的稅率。前一個是積極的抑商政策，後一個是間接的抑商政策。詳細些說吧：

例如鹽鐵，是人人也不能少的東西，商人經營鹽鐵致富的，在秦時真的遍地皆是，可是漢武帝用了孔僅的政策，收鹽鐵為國有，於是「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而吏益多買人矣」，（通典食貨志）此外如酒酤也於武帝三年收歸國有。在王莽時收歸國有者鹽、鐵、酒外再加名山大澤，均賒貸，銅冶三種。可是王莽壽命不長，不久漢室重光，就取消後列三種。這三種一直到現在還是如此。商人不是受了極大的害處麼？

稅率的繁苛也是中國歷史病商的大政策。稅重不但是多麻煩，而且是貨物騰貴，使人民不願購買。所以德意

志由封建社會突入資本主義以前，有李斯特等出而主張各地的關稅應該完全廢止，並截止外國貨物的流入，扶持國內生產品大量的發展，因此德國的商業興盛了。可是在中國呢？船有船捐，貨有貨稅，這裏繳了稅，到那邊去再須繳稅，一重一重的剝削商人。最足病商的，如唐德宗時借商錢五百萬緡文取做價納質錢，及粟麥糶於市者四取其一。宋太宗抽池塘河湖魚鴨之類在市販賣的稅，明仁宗抽船稅，以及後魏明帝時抽入市者的人頭稅錢一、店屋五等收捐等等都是病商之尤也！

(四)中國商人資本使用法的幼稚——資本是一個東西，可是用的方法不同，他的結果大異，工業資本時代才長成了資本主義，金融資本才長成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同時商業資本是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過渡

的產物。高利貸資本在農業的地方盛行。可見資本是該好好的利用的。可是在中國富豪商人是怎樣利用資本呢？簡單的說，是笨拙極了，是幼稚極了。所用的是什麼方法呢？比較聰明的使高利貸的方法，最笨拙的是窖藏起來，或是自己享樂消費完了。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工業資本不會發生，而資本主義社會也無從成立。

維特福格爾 (K. Wittfogel) 說：

「在東洋前期資本主義地域（埃及、印度、中國），放債者在今日，還是全社會制度內極可惡的榨取者。」氏著 *Geschichte der bur Gerlichen*

Gesellschaft）真的，過渡社會富商

巨賈們使用的方法也是如此。在春秋戰國時代已有了高利貸，例如孟嘗君的事，在漢朝以後，仍是繼續發展。在歷史記載的如北史蘇綽傳說：「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賈，

無者與之聖息。」可見那時代資本有兩個形式，一是商業資本，是「 $G-W-G'$ 」，這樣方式，其取得方法以貨物取來，賣去那時擡高其價，從中逐什一之利。一種是高利貸資本，是「 $G-(G+I)-G'$ 」（附註 G 貨指幣， W 指貨物 I 指利息）。資本論第三卷對於高利貸資本說是：「但先資本主義時代的高利資本，其特徵的形態，有兩個種類。所謂兩個種類，第一是對於豪奢的公侯，尤其對於土地的所有的高價放債；第二個是對於那領有自己勞動條件的小生產者，即對於小工業者，尤其對於農民的高利放債。」中國的情形後者比前者多，農民們又是受了多少無告的苦痛。

前面所說的，是商賈利用資本的一個方式，而商賈富豪不做高利貸或商業資本的，願把金銀珠寶藏在自己家裏的，却是比比皆是，例如：「郭況

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公卿諸侯，親家飲宴，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爲金穴。（後漢書光武郭皇后紀）這種笨拙的方法，中國資本那能發達呢！

所以我可以下一個結論，中國商業不能發達，工業當然更無從產生了。

至於對外貿易的情形呢？也是一樣的不發達啊！人們對於國外貿易不過祇求珍寶的獲得，沒有什麼大的衝動；而政府對於國外貿易却是只聽人民放任著不願獎勵著，此外如交通的艱難地位的狹小，自然更不是容易滋張國外貿易之途呢！現在我就這些缺點，分析起來，來看對外貿易的成績：

（一）人民祇求珍寶的獲得沒有什麼商業野心——中國對外貿易早已發生了，可是中國的輸入品終是珍寶香料，其目的不過在奢侈品貴金屬的獲得。例如漢書地理志所載的，『近海處

多犀象瑇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漚，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又後漢書西域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

宋史食貨志：『輸入品以香藥犀象瑇瑁琥珀珠璣鐵瑇瑁瑪瑙車渠水晶貓

眼番布烏楠木蘇木爲大宗。』這可見中國商人和歐洲商人初發現新大陸以

求貴金屬獲得的目的相同。可是不久『英國便拋却求金的目的，而專向商

業方面發展了』（見九岡重堯著美國經濟史）這就是英國商人的遠識，而

中國商人目光如豆，不容易發展。歐洲人在『歐洲以外用直接掠奪、奴隸

化、殺害等方法，榨取得來的財寶，流入母國，化爲資本。』可是中國的

商人沒有這野心，以致對外貿易了二千年一些沒有利益，其所獲得的珍寶

香料，試問有什麼用處？因此雖有了海外的市場，可以給中國飛奮的機會

，實際上還勾留在本國範圍之內，不能衝破社會，樹立資本主義的規模。

（二）政府對於國外貿易祇取放任態度沒有獎勵態度——商民既是目光如

豆，膽小如鼠，沒有雄飛世界的野心，可是政府能夠扶掖獎勵，也許可以挽回這衰頹的局面，衝入飛奮的路上

。歐洲的政府對於商業在資本主義初期時代，終見採取保護政策，因爲有

了保護政策才能使國家經濟獨立，工業上升，資本主義發達。但是中國政

府對於對外貿易的態度不祇是放任而已，而且還抑壓商人，如武堉幹在中國國際貿易史所說：『於此時期，政

府固絕力獎勵外商來華貿易，而於本國商人之遠航者，却有種種限制；非

獨不加保護，而且常加摧殘，中國對外貿易常處被動地位，殆卽以此。』

在這個情形之下，中國對外貿易怎能發達呢！對外貿易的不發達，資本主

義也無從興盛。因為資本主義唯一的特點是商品生產，所謂商品是「不以供自己使用為目的，而以與其他生產交換為目的。」這許多過剩的商品輸到那裏去呢？國內沒有這廣大的市場，唯有世界吧！可是中國國外貿易不注重，資本主義社會那能產生？

(三)對外貿易都市規模狹小變易無常——對外貿易必要有都市，中國都市除了城下為發生都市的原因外，就是這一途了。真的「市肆所會，萬商之藪，」成了都市是不難的。你看腓尼基埃及在地中海所設立的商業都市，也是和中國濱海處的對外貿易都市相同。不過歐洲的商業都市如在「意大利，那是因十字軍的結果，意大利的都市（威尼斯、琴亞諾），特有顯著發展的緣故，其次在德意志，也成立了稱為漢撒同盟的獨立都市的聯合。」（山川均資本主義以前的經濟史）

可見歐洲的都市能向內發展，可是中國商業都市沒有這個機能。而且中國對外貿易沒有廣大的土地，和繁博的貨物為之後盾，自然是生滅無常，不

能作固定的發展下去。據梁啟超的中國之都市一文，他有一個表是說明對外貿易都市的生滅，茲錄於后：

雲南	安南	廣州	泉州	寧波	海鹽	杭州	太倉	松江（附 <u>華亭</u> 上海）	揚州	青島	唐	宋	元	明	清（ <u>南京條約</u> 前）
	交趾龍編	廣州	泉州			杭州		秀州	揚州	密州板橋鎮					
		慶州	泉州	明州		杭州		上海							
		廣州	泉州	慶元	澈浦	杭州	太倉黃渡								
雲南	交趾	廣州	泉州	明州											
		粵海	閩海	浙海			江海								

他並概括說這十二個商業都市興亡的原因，他說是：『中國沿海十二大都市，尤大者為廣泉揚杭明秀六州，其他六地次之。最盛時期為唐宋，元尚繼續保持，自明以迄清中葉則為中落時期。其原因，蓋緣波斯大食人在唐宋時正為全世界商業活動最主要之民族，其人無政治野心，壹惟以通商為務；我國人亦以懷柔靖人之態度保護之歡迎之，耦具無猜焉，都市之繁